

袁宪军 王柯平 胡继华等 | 著

多维文化视野下的 浪漫主义诗学研究

上海文化出版社

多维文化视野下的浪漫主义诗学研究

袁宪军 王柯平 胡继华等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维文化视野下的浪漫主义诗学研究/袁宪军等著.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80740-765-2

I. ①多… II. ①袁… III. ①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世界 IV. ①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8224 号

出 版 人

王 刚

责任编辑

王建敏

封面设计

汤 靖

书名

多维文化视野下的浪漫主义诗学研究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网址:www.shwenyi.com

印刷

上海市印刷二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6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80740-765-2/I·594

定价

38.00 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21-59882178

前言

“浪漫主义”(romanticism)的话题是旧调重弹,然而这个话题所蕴含的学术潜力总让人觉得仍然有待挖掘,而且总是有新的东西被挖掘出来,所以重谈也是新谈。本书的著者试图从多维文化的视角重谈浪漫主义。这里的“多维文化”也可以说是传统上所谓的“跨文化”,是宽义的。一方面学术研究本质上脱离不开文化视角,这是由研究对象的文化语境和研究者的文化语境决定的;另一方面本书的著者处于一个与研究对象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没有文化上的“跨越”,研究就无从谈起;再者,本书的著者在研究过程中着意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在多维文化视野下以浪漫主义诗学的典型个案为切入点,着重研究浪漫主义诗学的希腊渊源、卢梭与浪漫主义的文化政治关系、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心灵诗学、英国浪漫主义的自然诗学和灵视诗学、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传统等。以历史的逻辑和审美的准则将国别文学和民族文学在浪漫主义标志下连接为一个整体,力图动态地把握浪漫主义诗学传统的异质性以及流动中的连续性。研究中还有意识地纳入观念史研究方法和解释学研究方法。运用观念史研究方法旨在发掘浪漫诗学的思想意义,采纳解释学方法以便呈现历史语境中浪漫主义诗学的视野融合,从多维文化的视角把握历史与诗学、文学与生活的复杂互动,将生命体验、文化语境、文学运动、诗学形态结合起来,探索其中的互动关系,在批评意识中深化理论内涵,在理论探索中验证批评实践。

波德莱尔说过:“浪漫主义不侧于主题的抉择之中,也不屑于艺术的真实性之内,而恰恰存在于情感的方式。”^①“情感的方式”尽管是客观的存在,但只能用主观来审悉,故而给“浪漫主义”定义之难不言而喻。美国学者洛弗乔伊(Arthur O. Lovejoy)曾说道,“Romantic”(浪漫主义者)一词的意义如此宽泛以至于就其本身而言它什么意义也没有,认为“浪漫主义”应该仅限

① 转引自 Hugh Honour, *Romanticis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p. 14。

于施莱格尔 (Friedrich Schlegel) 对“浪漫主义诗歌”(romantische Poesie) (1798) 的定义之上,其他的“浪漫主义”应该与之区分开。^①然而,施莱格尔本人对这一术语的应用也不尽一致,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于施莱格尔的定义也就有了不同的说法。尽管如此,“浪漫主义”定义中某些特征还是把握了其时代的精神,但是一些也为其他时代和文化所共有。而且,浪漫主义的诗歌、音乐、绘画、建筑等艺术创作,其主题、风格、技巧也大相径庭,而且重要的浪漫主义者均断然拒绝给自己冠名“浪漫主义者”。歌德和拜伦明确声明自己与浪漫主义毫无关系,雨果声称自己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一无所知。使浪漫主义者彼此相似的并非他们统一的艺术纲领或者诗学理论,而是他们的差异所在。反对被称为“浪漫主义者”,本身就是个人独特性这一浪漫主义信念的典型表现。

或许,我们可以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所谓的“时代的精神”(spirit of the age)——浪漫主义者明显或隐约感觉到的他们那个时代所拥有的而且有别于其他时代的东西——来界定他们的共性。“时代的精神”同样是一个概念非常含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术语。再者,某一时代突出的特点,在其他时代并非就是子虚乌有。某一时代的文化主流总可以在它以前的时代找到它的种子和萌发的潜力,只是时间和区域的气候和土壤等条件使它得以发芽成长并头角峥嵘。同样,浪漫主义时期的某些文化因素,也会为后来的某个时代埋下精神的种子。另一方面,“人类是创造性地回顾自己的自然物。”^②所以,我们对浪漫主义诗学的研究亦是在回顾我们自己,我们在努力发掘浪漫主义诗学所反映的“时代的精神”的同时,亦不忘追溯该精神的历史流动以及在流动中的变异,揭示其生命的脉动,即浪漫主义者所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时每刻所充斥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浪漫主义沿着一条神秘主义色彩很浓的道路走,这条道路通向内心,通向内心的感受。浪漫主义者在对事物的判断时仅仅诉诸于自己的情识、自己对事物的敏感性,或者说自己的亲身经历。霍夫曼于1810年写道:贝多

① Arthur O. Lovejoy, “On the Discrimination of Romanticism” (1923), i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Baltimore, 1948), pp. 228–253.

② Friedrich Schlegel, *Ideen*, n. 28, in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trans. Peter Firchow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 96.

芬是“纯粹的浪漫主义……音乐家，”因为他的音乐使人的各种情感栩栩如生，并且“唤醒那种可谓浪漫主义本质的无限渴望”。^①霍夫曼对贝多芬的评述，恰当地道出了浪漫主义者艺术创作的一个特点。我们在浪漫主义艺术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绘画，或者是音乐、雕塑，都能感觉到那内心中那无限的渴望所投射的磁石般的情感力量。

浪漫主义诗学同浪漫主义艺术创作一样，关注的与其说是艺术创作的规则、判断的正确性以及作诗的手法，毋宁说是个性、感情的完整性和诗歌本身。浪漫主义诗学力图发现某些艺术作品具有强烈的感受力而其他一些作品却不能打动读者的原因，尽管它们同样遵循某些沿袭下来的创作规律而且也蕴含着人类思想的伟大成果。为了使感染力的揭示真实可靠，浪漫主义者的“批判”(critique)自身也常常具有了“感性”的力量。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客体内在于主体的自我完成，同样，诗歌也内在于诗学的机制。施莱格尔说道：“诗歌和哲学分开时所能做的已经做了且已经完成了。所以，将两者合二为一的时候到了。”^②哲学的诗歌化和诗歌的理论化，不仅在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Novalis)而且在大多数浪漫主义者都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实践活动。对于艺术的批判性反思，并非只在说明艺术是什么，而且还在生成艺术、丰富艺术。所以，我们对于浪漫主义诗学的研究，也就是对浪漫主义诗歌(文学)的研究，反之亦然。

就本书的内容和形式，需要说几句话。它所探讨的是浪漫主义诗学及其在诗歌中的实践。之所以就这些文化产品进行探讨是因为它们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经历再生产，而且我们觉得，浪漫主义的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召唤的精神。本书没有试图涵盖浪漫主义诗学的各个方面，也没有想对浪漫主义诗学做系统的论述，而是如前所述努力通过个案分析认识浪漫主义诗学传统的异质性以及流动中的连续性，把握浪漫主义诗学的时代精神。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篇，讨论浪漫主义诗学的渊源与概念；第二部分为实践篇，关注浪漫主义诗歌与诗学的紧密联系。

① 转引自 O. Strunk, *Source Reading in Music History* (London, 1952), p. 777.

② Friedrich Schlegel, *Ideen*, n. 108, in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trans. Peter Firchow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 104.

追根溯源,浪漫主义诗学的发祥是古希腊,尤其是柏拉图。《柏拉图如何为诗辩护?》修正了人们普遍认为的柏拉图要把诗歌逐出他的理想国的观念,提出了诗歌的审美价值会对人产生积极的影响、会与诗歌的道德价值互动的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不仅为诗歌辩护,而且还常常借助神话和比喻这样的诗歌话语形式陈述他的思想。浪漫主义诗学可以简单地称为“心灵诗学,”因为“想象”、“情感”“灵感”等与心灵相关的概念可谓浪漫主义诗学的核心。《柏拉图的心灵诗学喻说》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浪漫主义者的心灵说或者意识说提供了可信赖的依据。《“弥美说”的起源与生成》追溯贯穿于西方诗学与美学的重要术语“μυμησις”,纠正了它在译介过程中的谬误,认为追根溯源尤其柏拉图的使用该词远远超出“摹仿”的意义,它涵盖着酒神颂歌的直抒胸臆和悲剧的表演再现。故而,浪漫主义者所推崇的诗学宗旨亦与之有不解之缘。卢梭的学说对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是家喻户晓的,我们不仅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可以看见卢梭的旗帜,而且卢梭的影子在浪漫主义诗歌和诗学同样兀凸浓重。《公共意志与个人自由——论卢梭的“公意说”》从一个侧面解读了卢梭与浪漫主义诗学的联系。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肇始,是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于1798年出版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①而华兹华斯1800年《抒情歌谣集》第二版的序言,可谓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宣言书。《华兹华斯的诗学理论片议》发掘了华兹华斯关于诗歌的本质、功能、题材和语言以及诗人的才能、想象力等,论证了一个有着严格内在逻辑的、既有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继承又有突破传统的创新与发展的理论体系。《威廉·布莱克的悲剧意识》和《威廉·布莱克的灵视世界》分别剖析布莱克的思想基础即悲剧意识和不同层次的想象在布莱克诗歌创作中的作用,从布莱克的诗学思想透视浪漫主义者所共有的社会关怀以及探索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方法。英国浪漫主义在发展中异变,然而,异变只是言说的形式和看待事物的角度,浪漫主义的“精神”不仅始终贯穿于发展和异变,也是发展和异变的动力。浪漫主义发展到罗斯金和王尔德的时代,诗学的“前大灯”从艺术与社会变革的关系转向艺术在养育道德情操方面的作用,尽管对诗歌

① 当然,在《抒情歌谣集》出版之前,已有许多文学史上列入浪漫主义文学的诗歌问世,如威廉·布莱克和罗伯特·彭斯的诗歌等。

本身的关注一以贯之。《罗斯金论美的两种形态》旨在探讨罗斯金关于视觉艺术美和情感表现美的思想,或曰典型美和活力美。这两种美的形式均是鼎盛时期的浪漫主义诗学思想的发展。《罗斯金的绘画诗学观》从诗歌与绘画两种艺术形态论证“想象”的类型和运作活动,说明在服务于“最最高尚的目的”的宗旨下诗歌与绘画的一致。尼采可谓浪漫主义诗哲一体化在19世纪下半叶的典型代表,他把自己的哲学和诗歌都凝结于“生命”。《尼采的“生命”释义》试图从生命的生成性存在以及生命的个体生存之创造性本性探讨尼采的诗学,解析个体生存如何与无限融为一体这一浪漫主义的永恒主题。《让大地成为大地》则是探讨海德格尔在20世纪的语境下关于自然与艺术本质的追问。我们知道,对自然与艺术的关系之探讨,不是浪漫主义所发轫,但是在浪漫主义诗学和诗歌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毋庸置疑的。海德格尔所谓的艺术“作品使大地成为一片大地”的名言,再次言说了浪漫主义对艺术的自然本质的关怀。进入20世纪后半叶这个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时代,布鲁门贝格对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进行了严肃的反思,提出了“神话终结”论。《布鲁门贝格的“神话终结”论》与德国唯心主义/浪漫主义之悲剧绝对性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文化语境关联。“终结神话”并非是通过精神暴力来拆解神话,而是个体在接受的过程中通过“神话研究”让自己重新占据“终极神话”的位置。这种在审美接受与创造解释之中“伸张自我”、“指引他人”的姿态,正是多维文化视野下的浪漫主义姿态。

进入中国的浪漫主义诗学,既保持着其自身文化语境下“时代的精神”,又汇入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浪漫精神之黄河,从而在一定意义上镌写了中国20世纪的新诗学。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不仅体现了“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还大声疾呼了“自觉勇猛、发扬精进”这一浪漫主义者式的“精神界之战士”。《〈摩罗诗力说〉与摩罗式崇高诗学》从《摩罗诗力说》的历史地位到它所提出的新的文化观、文艺观、美学观和伦理观均进行了精进的探讨。“唯有其思想具有塑造功能”,英国浪漫主义批评家哈兹利特(Hazlitt)说道。^①谈到中国20世纪的诗学,不能忽视康德

① 转引自 Paul Hamilton, *Metaromanticism: Aesthetics, Literature, Theory*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 6.

的影响。康德,名义上是反浪漫主义者,实际上可以说是浪漫主义之父之一。康德思想在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中所发挥的塑造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康德思想在中国浪漫主义以及现代诗学发展中的塑造功能,正是《康德与中国现代诗学中的“崇高”观念》所关注的对象,解读了康德关于“崇高”的概念如何通过朱光潜、梁宗岱、王国维和蔡元培的思想而转化为中国诗学的核心问题。《中国现代诗学中的审美“无利害性”观念及其意义》,则是康德思想中国化的再次探索。

鲁迅所颂扬的“精神界之战士”,恰如其分地规定了浪漫主义者的本质属性。浪漫主义理论家,首先是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用辛勤的耕耘践行着自己的诗学思想。本书的下篇,关注浪漫主义诗人如何把诗学思想贯彻于艺术创作中,揭示生命的本质在艺术活动中的意义。内容涉及德国、英国、俄国、美国和中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作品。《忧郁的面纱笼罩憔悴的渴求》,尝试将浪漫主义文化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以视觉艺术的属灵性作为视角,从而把握早期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画中所呈现的渴求与忧郁,以及艺术主体所追寻的那一“悲剧的绝对性”。《〈水仙〉与华兹华斯的诗学理念》则是通过对华兹华斯的抒情诗《水仙》的具体分析,透视他诗歌定义“强烈感情的自然流溢”在诗歌的运作,并昭示浪漫主义者的风骨。《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就《丁登寺》等诗歌所承载的自然、宗教、伦理、审美和人性等诗学意义进行探讨,而这里反映的浪漫主义者的思考和追求,恰恰弥补了现当代人在物质生活丰腴时所感觉的缝隙或者空虚。《从浪漫之“桥”到现代之“窗”》则对华兹华斯的《在威斯敏斯特桥上》和艾略特的《晓窗即景》进行了对比分析,从两首诗所描写的景象可以看出现代主义代表艾略特所揭示的20世纪人类心灵与19世纪浪漫主义者的心灵之间的变化和差异。雪莱与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一样,是英国浪漫主义的诗人理论家,他的《为诗一辩》把艺术和艺术的创造者推向世界万物等级的顶端。《艺术对历史的消解》通过对《奥西曼迭斯》的分析,展现雪莱如何用诗歌词语的隐喻意义颠覆历史人物奥西曼迭斯,暗示了艺术消解历史的作用以及艺术与永恒的关系。《〈希腊古瓮颂〉一诗中“美”与“真”》从济慈推崇的想象的层面解读美与真的关系,发掘诗人在《希腊古瓮颂》中如何探讨把视觉艺术和音乐溶入诗歌。《普塞克:爱情、灵魂、诗歌的象征》分析济慈关于诗歌根源、诗歌话语、

神话和诗歌创作的观点,把爱情、灵魂、诗歌有机地统一于一体,揭示了诗歌意象的感性特点。济慈诗歌和诗学的唯美和唯感性反映出浪漫主义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王尔德推向了极端。《王尔德的纨绔诗风》针对王尔德把语言作为“纨绔”的方式、铺张语言的外部奢华、强化写作过程的快乐进行研究,王尔德的诗歌着意语言在刺激感官经验的丰富性和敏感性方面显露自身的美质,从而达到“唯美”的效果。《生命的悖论与游戏的衰落》揭示赫尔曼·黑塞如何通过《玻璃球游戏》对浪漫主义进行反思。黑塞的《玻璃球游戏》杂糅了诗歌、箴言、自传、传奇、书信、随笔等文学体裁,对作家本人展开了深度反思,通过自传艺术追溯生命之流。玻璃球游戏衰亡,标志着浪漫时代的终结,黑塞因此而成为浪漫主义的守灵人。《梅列日科夫斯基:美与爱的灵歌》同样探讨文学的本质在于“神秘而永恒的感性”。在梅列日科夫斯基那里,象征不只是一种艺术方式,还是连接两个世界的中介、架在心灵深渊上的阶梯,是从诸神死亡到诸神复活、从反基督到端详基督面容的生命过程,以及从圣父秩序到圣子秩序再到圣灵秩序的历史文化过程。《〈自我之歌〉:灵与肉的协奏曲》再次探讨浪漫主义者灵与肉、人与自然的关系,用惠特曼的《自我之歌》作为个案,呈现个体的人作为大自然的一个因子的必然性。本篇的最后归到中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穆旦。《从浪漫到现代:穆旦诗歌中的自我形象》试图在中西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诗歌的历史语境中,研究穆旦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如何从有机统一走向分裂破碎,如何从个性化走向非个性化,它们既非纯粹浪漫主义意义上的抒情形象,也非纯粹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知性形象,亦与中国古典传统背道而驰,具有一种复杂丰富、含混多变的现代特质和中国特质。穆旦有意识地借鉴、吸纳西方诗歌传统,植根中国文化传统和自身的生命体验,力图把抒情与知性、个性与非个性、理想与写实、西方传统与中国现实融合起来,在雪莱、普希金的抒情性与艾略特、奥登的现代性之间寻求某种结合点,为我们思考汉语诗歌的未来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本书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所承担的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多维文化视野下的浪漫主义诗学研究”(项目编号:09BaWY051)的集体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有王柯平、胡继华、梁展、刘燕、杨平、院成纯和袁宪军,项目主持人为袁宪军。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中国社

科院外文所的大力协助,得到学院科研处和财务处的鼎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项目组成员根据自己所承担的部分撰写了书中的不同内容,许多内容已经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著者的名字在篇目注明。本书各篇就相关论题所呈现的论证及其结论,均为一己之见,欢迎读者同仁提出不同意见,开展争论,进而深化学术研究。

袁宪军

上编 理论篇

柏拉图如何为诗辩护? 王柯平 / 3

柏拉图的心灵诗学喻说 王柯平 / 20

“弥美说”的起源与生成 王柯平 / 34

公共意志与个人自由——论卢梭的“公意说” 梁 展 / 52

华兹华斯的诗学理论片议 王柯平 / 59

威廉·布莱克的悲剧意识 袁宪军 / 80

威廉·布莱克的灵视世界 袁宪军 / 90

罗斯金论美的两种形态 王柯平 / 104

罗斯金的绘画诗学观 王柯平 / 121

尼采的“生命”释义 阮成纯 / 134

让大地成为大地——海德格尔的“自然”追问与艺术作品的本质 梁 展
/ 144

布鲁门贝格的“神话终结”论 胡继华 / 165

《摩罗诗力说》与摩罗式崇高诗学 王柯平 / 183

康德与中国现代诗学中的“崇高”观念 杨 平 / 203

中国现代诗学中的审美“无利害性”观念及其意义 杨 平 / 216

下编 实践篇

忧郁的面纱笼罩憔悴的渴念——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绘画中一道“灵”的风
景 胡继华 / 227

《水仙》与华兹华斯的诗学理念 袁宪军 / 248

华兹华斯的自然观:析《丁登寺》 袁宪军 / 259

从浪漫之“桥”到现代之“窗”——《在威斯敏斯特桥上》与《晓窗即景》的对比分析 刘 燕 / 274

艺术对历史的消解:雪莱的《奥西曼迭斯》 袁宪军 / 286

《希腊古瓮颂》一诗中“美”与“真” 袁宪军 / 291

普塞克:爱情、灵魂、诗歌的象征 袁宪军 / 307

王尔德的纨绔诗风 袁宪军 / 319

生命的悖论与游戏的衰落——评赫尔曼·黑塞《玻璃球游戏》 胡继华 / 333

梅列日科夫斯基:美与爱的灵歌 胡继华 / 352

《自我之歌》:灵与肉的协奏曲 刘 燕 / 373

·从浪漫到现代:穆旦诗歌中的自我形象 刘 燕 / 381

上 编
理 论 篇

柏拉图如何为诗辩护？

王柯平

在《理想国》里，柏拉图由于对诗人和诗歌进行过谴责与控告，因此在西方诗学史上落下了千古骂名。事实上，这并不代表柏氏诗学思想的全貌，充其量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而且经常被人夸大其词地加以利用。要知道，柏氏是一位谙悉诗歌艺术和提倡诗乐教育的诗人哲学家，通常是根据一定的认识论原则和道德理想原则，来确立和调整自己对待诗人与诗歌的具体态度的。可以说，他手中握有一把谴责与辩护的双刃剑，对诗人与诗歌总是有选择有条件地行使着自己的评判和话语权力。在他那里，谴责与辩护的思想变奏，貌似一种相互矛盾的悖论，但细加考察以后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事实真相的两个不同方面而已。究其本质，这一切应是柏氏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工具论思想的逻辑必然。本文着重探究柏拉图如何以直接与间接的方式为诗辩护。

一、直接的辩护

所谓直接的辩护，主要是指柏拉图以直截了当和明白无误的话语方式，对诗人与诗歌进行肯定性的赞扬或有条件的利用。在《理想国》里，对荷马的赞扬就有多处，譬如，尊其为“全希腊的教育者”，“最高明的诗人和首屈一指的悲剧作家”，“美的悲剧诗的祖师爷”，“从小对其怀有一定的敬爱之心”等等。^①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些肯定性的赞扬往往伴随着否定性

① Plato, *Republic* (Loeb edition, tr. Paul Shore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63), Book X, 595b - c; 606e; 607a.

的批评。这些批评多少带有忍痛割爱的味道,但出于“更爱真理”(της αληθειας)的信念,只好一吐为快,其中大多数是从道德教育和心灵塑造的利害角度出发,抑或谴责诗人作为摹仿者缺乏真知灼见,抑或控告史诗中对神祇和英雄的有些描写缺乏道德责任感。当然也有例外。譬如在《理想国》第五卷里,当谈论英雄行为与品格的时候,柏拉图习惯性地使人们的注意视线引向荷马史诗,表现出一种完全肯定和推崇的积极态度:

荷马诗篇中讲起过,用下述方式敬重年轻人中的勇士是正当的。荷马告诉我们,阿贾克斯打起仗来英勇异常,在宴席上受到全副肌肉的赏赐;这样对于年轻勇士来说既是荣誉,还可以增强他们的体力。在这方面,我们至少可以把荷马作为我们的榜样(Πεισομεθα αρα ταυτα γε'Ομηρω)。在祭礼与其他类似场合上,我们表扬那些功勋卓著智勇双全的优秀人物,给他们唱赞美诗,给他们刚才讲过的那些特殊礼遇,给以上座和羊羔美酒,这样对于这些男女勇士,既增强了他们的体质,还给了他们以荣誉。^①

这里与其说是从礼遇的角度称赞荷马,还不无说是从教育的角度肯定荷马。这段诗歌源于《伊利亚特》第7卷320-322行,主要描写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对勇士阿贾克斯的赫赫战功表示嘉奖的聚会。他在自己的居所将一头

① Plato, *Republic*, Book V, 468c - e. 荷马对阿贾克斯英勇作战的有关描述,可参阅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7卷321-322行;另可参阅第8卷162行,第12卷311行。第7卷里用很多笔墨,渲染了特洛伊城英雄赫克托与希腊联军勇士阿贾克斯之间的激烈战斗。两人争斗斗狠,锐不可当,杀得昏天黑地,令在场的将士目瞪口呆。战斗歇息时,希腊统帅的最高统帅阿伽门农用大块烤肉犒劳阿贾克斯。柏拉图引用此诗的目的可能是对勇士的战斗精神和统帅的奖励措施深表欣赏,认为这样有利于培养年轻人学习效仿,闻贤思齐,争做勇士。原诗的英译文为:“On there side, the Achaeans/conducted Aias (Ajax) in his pride of victory/to Agamemnon. In the commander's hut/Lord Marshal Agamemnon sacrificed/a five-year ox to the overlord of heaven./Skinned and quartered and cup up in bits/the meat was carefully spited, roasted well,/and taken from the fire. When all the food/ lay ready, when the soldiers turned from work,/ they feasted to their hearts'content, and Lord Agamemnon, ruler of the great plains,/ gave Aias the long marrowy cuts of shine.”(Homer. *The Iliad*. tr. Robert Fitzgera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vii, pp. 314 - 322)